

普通语义学——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

亚当·沙夫著

贾佳译

在《语义概念的真理性和语义学基础》一文中，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对语义学的基础做了精准的阐释：

正如在这篇论文（以及作者之前的论文）中所设想的那样，语义学是一个清醒而谦逊的学科，它不会将自身装扮成某种被广泛应用的“成药”，用以治疗人类想象出、或是实际存在的各种病症。在语义学中，你找不到任何解决龇齿、谵妄，以及化解等级冲突的方法。语义学并非一种一劳永逸的良药，它认定，除了说者及其朋友外，任何人的言论都可能是有意义的。

①

不难猜想，谁会是以下报纸公告中辛辣言辞的接受者：“我对丈夫的债务和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再比如，下面来自阿尔弗雷德·柯尔齐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著作中的文章，虽然该文被国外研究文献广泛引用，但在波兰却鲜为人知：

新的方法能够消除或者缓解不同的语义障碍，减弱一些神经或精神疾病的“情绪干扰”，排除不同的学习、阅读和语言障碍等，并调整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一般性失调状况。这些障碍，使本该获得恰当评价的“智力”得不到的充分的施展。

众所周知，有许多由身心失调引发的疾病，比如心脏病、消化或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性”病，慢性关节疾病、关节炎、龇齿、偏头疼、皮肤病、酗酒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疾病是由语义障碍产生的后果，同时，神经语

沙夫，华沙大学哲学教授，波兰科学院成员，撰写论著过百，包括论文、文章以及专业书籍等。其中最著名并被广泛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两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Marxist Theories of Truth*）（1951），《语义学简介》（*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1960）。他于1961年应福特基金会（见《时代》（*Time*），1961.6.2）的邀请访问美国。沙夫自儿时起，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员。所引的文章是他《语义学简介》中的第四章，它被华沙大学 Olgierd Wojtasiewicz 教授翻译为英文。

① Alfred Korzybski,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in *Seman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d. L.Linsky (Urbana, Ill., 1952), p. 17.

义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建立，正是为了研究这些问题。通常的语义学训练，并不是从医学角度进行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消除产生语义障碍的不利因素后，相应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比如学生可以通过自学而完成自我改进。^①

据我所了解的波兰语义学代表学者的观点和态度，我可以轻易地想象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在读“菜单”似的各种疾病的症状时所产生的“恐惧”（是的，这正是那一时刻的感受），因为他们都涉及一个足可敬畏的术语——“语义学”。

平心而论，塔斯基太过强调早期语义学和他本人所谓的语义学之间的差异性。

在旧“语义学” (semantics) 和“一般语义学” (general semantics) 之间，总是存在对基本概念发生混淆的问题。旧语义学与语词“意义”理论相关，而且词语被其他词语所定义；而“一般语义学”理论的产生，仅在于研究神经语义和神经语言的生命反应 (living reactions)，例如对 Smith₁、Smith₂ 的反应等，他们将神经语义和神经语言环境看作环境本身的反应。(SES, p.x)

我们还必须同意安纳托尔·拉波波特 (Anatol Rapoport) 在《什么是语义学？》 (*What Is Semantics?*)^② 中所提出的观点。拉波波特在这篇著名且令人受益匪浅的文章中，面对学术界和柯尔齐布斯基的后继者，合理地驳斥了阶级语义学、以及同一思潮中柯尔齐布斯基所谓的普通语义学观点。无论如何，我们很可能无法有效地界定语义学本身，因为它与逻辑学、认识论、普通语义学息息相关。其中，普通语义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疗法，在语义学的阐释工作中最具代表性。

在某些方面，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具有渊源上的联系，但是与所产生的主要影响相比，这些联系却显得肤浅而固陋。事实上，对于这两种语义学类型，我们总是需要处理它们各自的趋势及所持观点的问题，它们不仅彼此不同，一旦将它们各自代表人的态度考虑进来，甚至会使得两者变得截然相反。这就是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概念的混淆会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大行其道的原因，即便是最严谨的作家莫里斯·康福斯 (Maurice Cornforth)，也曾将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在其《科学 VS 理想》 [*Science Versus Idealism*] 一书中）。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一味追求其轻浮的胜利果实，才

^① Alfred Korzybski, *Science and Sanity*, 2d ed. (Lancaster, Pa., 1941), p. vii (下文中简称为 SES).

^② Anatol Rapoport, in *Language, Meaning, and Maturity*, ed. S.I. Hayakawa (New York, 1954), pp. 3-18.

造成了目前的状况。在此状况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往往盯着那些错误的、荒谬的、薄弱的环节，而对那些正确而充满智性的见解却视而不见，尤其是对那些不符合“黑白两判”模式的著作。用这样的理论，自然可以对付任何异议者，更不用说像普通语义学这样充满晦涩、矛盾陈述的学科。然而，从这种轻率而荒谬的批评方式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启示呢？在我看来，毫无裨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批评的观点所持有的否定态度，仅仅是表面的。

关于思想体系问题，对其“不闻不问”绝非明智之举，作为预先抵御外来思想体系^①影响的一项措施，思想体系却往往在关键时刻一筹莫展。另一方面，一旦采取这种措施，那么我们遭受的损失将是显而易见且无可挽回的：我们将损失数量可观的人类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激发创造性的分析思维方面，在某些时候依旧是十分重要的。阅读通常有两种方式：将书中寻得的错误和愚笨的观点作为批评的“猎物”，这也是那些不懂得利用科学成就的人所惯用的一种典型的阅读方式。但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阅读：从书中所涉及的大量案例中，寻找那些对科学来说是新颖的、启发性的和创造性的知识，这便是那些深谙如何利用科学的人所青睐的读书方式。在一部科学著作中，即便仅仅包含一个新颖而富有创新性的观点，也足以推动科学创造性的发展，而这样的观点绝不应湮没于浩如烟海的错误认识之中。

在依据这种方式检审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摒弃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视域中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活动。我已经谈到了这些实践，但当我们讨论普通语义学的时候，我们的反思却获得了双倍的反响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与他们的联系中，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审视在批评中犯下的全部错误和缺点。诚然，有些时候我们无法摆脱尴尬的感觉，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尴尬感产生于我们在批评过程中忽视了太多东西。毕竟多年以来，只有从忽视的角度，才能解释如何认定普通语义学背景下的语义学本身，才能认定斯图亚特·切斯（Stuart Chase）（柯尔齐布斯基观点的追随者）在继承卡尔纳普（Carnap）和塔斯基言论之后所发表的观点。进一步说，只有从忽视的角度，才能解释无法发现真正问题的原因，而只有有效把握这些问题，才能为普通语义学夯实基础。人们往往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文献中出现的任何一个讨论过柯尔齐布斯基的人，都没有通读过他的所有著作。我这么说，倒不是为那本书做辩护，恰恰相反，除了所有其他缺陷外，我更是认为此书夹杂着病态的偏执特性。但是，我们的文献对它所做的批评却未能击中要害：未能揭露出它本质的错误，而且无法直面它所讨论的问题本身。不难发现，柯尔齐布斯基的《科学与卫生》（*Science and Sanity*）是一部浅尝辄止的晦涩著作。在书中，模棱两可、东拼西凑的概念比比皆是，而且经常

^① 原文中的这两处，分别使用了 *ideology*、*ideological* 两个词，一般译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但此处意指某种一般性思想、知识体系，因此译为“思想体系”。——译者注。

随意化用他人的观点。中肯地讲，书中的正确观点不过是些老生常谈，而其新观点却错不忍读。同时，人们会轻易发现，该书沿袭了巴甫洛夫（Pavlov）的某些观点，而且其中某些概念，与认识论上的实在论（epistemological realism）、认知过程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观念极为接近。作者曾声明，书中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契合，而这恰恰证明了他忽略了很多东西。截止目前，我们的文献对这本书的忽略程度，与柯尔齐布斯基书中略去的内容相差无几。那么，对普通语义学派中的其他人，比如拉波波特、早川（S.I. Hayakawa）、欧文·李（Irving J. Lee）、和温德尔·约翰逊（Wendell Johnson）等，该怎么看他们的著作呢？

毫无疑问，普通语义学与通常的科学标准相距甚远。在研究《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这么个怪里怪气的混合物时，我们应当牢记，这样一个特殊的美国式产物，与其说是个宗派（sect），倒不如说是个学派（school）。关于这个问题，某些清醒的观察者早已有所觉察，而即便在普通语义学的众多信徒中，那些较为清醒的学者们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以下是拉波波特在上文提及的那篇文章中的话：

柯尔齐布斯基的追随者，对他表现出宗教崇拜般的狂热，那么，对他们的指责便显得有理有据。在美国，有一大群人标榜要追求真理，却又如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他们中的很多人缺乏追求知识和智慧所必需的坚韧毅力；而另一些人却没有批评和评估的能力，从而无法分辨问题的真实与虚假；更有甚者，总是表现得毛毛躁躁，直到找到能使自己信服的灵丹妙药。对形形色色的“运动”（movements），他们趋之若鹜；对五花八门的教派，他们如影随形。他们似乎“拥护”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作为技术统治，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①）看作神智学（theosophy），将伟大的图书工程（the Great Books program）看作智力学（dianetics）。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普通语义学颇感兴趣，也便不足为奇……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便很难界定他们究竟是受到了普通语义学的、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然而，他们我行我素地四处鼓吹自己的信念，却给“运动”增添了一抹迷信的色彩。（p.6）

普通语义学具备一般宗派运动的所有特点，当然，它拥有属于自己的追随者。前文引述的作者自己即可证实，这个“宗派”具有清醒和现实性的批评特点。拉波波特认为柯尔齐布斯基的作品是一部蜻蜓点水、晦涩不堪的读物，并且与其所

^① 原文为 psychonanalysis，应为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译者注。

宣扬的观点相抵牾，根本不是经验性研究的结果。之后他总结道：

如果说不能将柯尔齐布斯基建立了一门经验科学，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他指明了建立这样一门科学的具体方法。可以说他是**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的先驱**，虽然这场革命刚刚兴起，但它必将与文艺复兴相媲美。如果将柯尔齐布斯基看作先驱，那么对其独创性和学养的质疑就变得无足轻重。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许只能算个业余人士，但他却竭力假装自己具备充分的学识。他的很多观点，都可以在其他人的著作中找到，而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却都是谦逊而严谨的人。当然，这些并不重要。柯尔齐布斯基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信徒，在我们这专业化的时代，这样的人才实在屈指可数。

由此来看，一位理智的思想者，变成了一个盲从的宗派人士！如果我们想了解什么是普通语义学，以及它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获得社会性成功的原因，那么有一个有益的现象值得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众舆论的宣传作用，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态度和行为的交流影响，而这种关注的结果导致了纳粹主义的诞生。这些具体状况，使身在美国的柯尔齐布斯基开辟了一个生气勃勃、迅速发展的领域。我在此特意提到柯尔齐布斯基的观点，是希望将他至少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观点清晰地区别开来。对于后者，我不仅觉得他们的观点十分富有价值，而且对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们的诸多观点和活动，解释了普通语义学不应被视为假模假式和萨满教的原因：在全力批评它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忽略由它所呈现出来的真正问题。

现在，我尝试向读者简明扼要地介绍柯尔齐布斯基的基本观点。

他自己将普通语义学定义为研究神经语义（neuro-semantic）和神经语言（neuro-linguistic）反应的科学，这种反应源于人类个体对语义“环境”影响的表现。拉波波特用一种更便于理解的方式来定义普通语义学，将其看作一种“人们如何使用文字，文字反过来就如何影响人”（p.4）的科学。这其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被莫里斯（Morris）称作“语用学”的符号学支系。

对于柯尔齐布斯基来说，普通语义学是涵盖一切问题的心理治疗法（psychotherapeutic technique），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从胃痛、龋齿到社会冲突，普通语义学足以涵盖任何问题。从这种思路来看，柯尔齐布斯基受到了弗洛伊德思想模式的指引，他观点的理论构想可以被概括如下。

柯尔齐布斯基的兴趣和分析的起始点，是一种关于人与文化的普通理论，这也是他第一本著作《人性的气概》（*Manhood of Humanity*）（1921）的主要观点。

从这个思想角度看，他探讨了符号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者更严格地说，探讨了症候的病理学（pathology of signs）问题。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删繁就简地审视这些事实的本质，那么它们看起来要比事实上更加理性和重要。柯尔齐布斯基的观点是从不同学科中抽取而来的理论的混合物。在他全部的解释工作中，有个主要的观点十分夺人耳目：所有机体病理学和社会病理学都是语义性的：“听我便得救！”

解决方法十分简单：摒弃已经过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体系（二价模式）（two-valued），转而支持非亚里士多德体系，亦即反对传统逻辑的二价原则，而造成所有不幸之源的语义障碍将会马上消失。当然，他的这种想法和表述有点言过其实。

柯尔齐布斯基在不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些理论资源，首先包括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巴甫洛夫的理论（Pavlovian theory）（柯尔齐布斯基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条件反射理论的发展）。弗洛伊德学说，为他明确提出关于符号病理学的观点提供了思路，而这也是非弗洛伊德语言和相关心理治疗理论的立论点。

让我们把非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non-aristotelian language system）的普遍认识作为着眼点。现有的语言系统，亦即柯尔齐布斯基所说的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谈到印欧语言体系，他有一些理性的追捧者，比如早川），被认为采用了二价模式的评价系统，并被视为导致一些神经性疾病的诱因。相反，非亚里士多德体系据称实现了与当代科学的联姻（在他的论证中，柯尔齐布斯基经常毫无根据地滥用诸如“胶状的”“量子”等科学词汇），评价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卢卡西维茨（Lukasiewicz）的思想以及他的多价逻辑（many-valued logic）理论可以很清晰地被把握（参考文献中已提及此人），但是这些观点被使用的途径，却与最初概念毫无关系，而且这种途径丝毫不能证明他们新的应用方式的合理性。

但是问题仅仅由此开始，现在我们学习了关于非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的新的具体知识。

首先，把“系词”（copula）用作认同（identification）手段是不可取的。柯尔齐布斯基说，“词汇并非它所指称的事物”。在“非语词层面”（nonverbal level），我们只能指点事物，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时，我们辨识出词语和客体的关系，从而提出了重要的语义病理学（semantogenic pathology）。我们再次认识到“非语词阶段”这个概念源于新实证主义者。但在柯尔齐布斯基这里，它却变得十分滑稽，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以他所建议的方式来认同词汇及其客体。柯尔齐布斯基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就是在心理不断重复、暗示“这不是一张桌子”，

换言之，就是根据“差异构造”（*structural differential*），执行恰当的机械操作指令，使这种方案带上了一丝萨满教气息。

第二个主要的原则指出，“地图(*map*)不是领土 (*territory*)”，也就是说，一个符号无法充分代表客体。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被认为是“元素主义”（*elementalistic*），它将对事物的认知看作由诸多基本元素所构成的完整性和必然性。非亚里士多德体系被称为“非元素主义”（*non-elementalistic*），而且它意识到整个认知过程的重要性，这很明显回到了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路径。

最后，第三个原则论述了象征（*symbols*）的“多创性”（*multiordinality*）。地图不仅不是领土，“地图₁”的“地图”也不能代表“地图₁”本身。换句话说：我们用以表达另一种语言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语言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的层级，将词语放置到清晰的语境中，来避免模棱两可的情况，以此得知抽象概念所在的层次。我们能够轻松地辨识出罗素所提出的关于类属、以及语言层级相关概念的理论。

从这些理论假设开始，柯尔齐布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一个关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内容遍及研究精神错乱者的语言、及研究高等数学的语言。他的目的是创建一种心理治疗法，这种治疗法可以使他确定语言的新结构，从而建立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也被认为有利于整体提高社会心理健康水平，因此，他为此书取名为《科学与卫生》。

柯尔齐布斯基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目的在于通过运用“非亚里士多德”结构来修正语言的使用方式。

首先，指示符（*indices*）应当与普通名词相联系，这样可以将容易让人产生困惑且不同类的对象概念加以简化，以此强调个体的明确性和独特性特点。根据柯尔齐布斯基的理论，如果我们不说通常意义上的“黑人（*Negro*）”，而是说具体的“黑人₁（*Negro₁*）”“黑人₂（*Negro₂*）”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消除引起种族仇恨的根源。

第二，时间也应当被考虑进去，以此来区分现象的多面性影响，以此避免产生误解。因此，我们最好不说“威廉·莎士比亚”，而是说“威廉·莎士比亚_{1600年1月的}”“威廉·莎士比亚_{1601年2月的}”等等。

第三，所有特征都需要辅以“等等”（*etc.*）一词，用以提醒我们这个“地图”并不代表整个“领土”，或者换个说法，我们从来不会达到完全认知的程度。（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普通语义学主要期刊 *ETC* 的名称如此怪异的原因。）

最后，柯尔齐布斯基建议使用双引号来标示意义，以此将我们自身剥离于词汇的本质意义之外。

作为一种有效方法，柯尔齐布斯基建议在练习时使用一种被他称为“差异构造”（structural differential）的方法；这些练习应该让病人意识到，首先，这个词并不是它所指代的对象，其次，这个词拥有不同层次的抽象涵义。

这个简明的报告是否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柯尔齐布斯基正确的理论是众所周知的旧真理，而其中新的观点却又是错误的？

我不愿对“语义学”方法的治疗手段发表评论。毫无疑问，心理性的小病症是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也没有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差异构造”也会起到与众不同的作用。但这是个完全不相干的议题。

难道柯尔齐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只是应被丢入垃圾桶的无稽之谈吗？难道它仅仅是些根据阶级立场而随意炮制出的理想主义把戏，一如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所宣称的那样？对此，我毫无把握。

柯尔齐布斯基观点包括一些不应被轻易忽略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奇异，而且简单疯狂。柯尔齐布斯基所使用的例子涉及面十分广泛，因此有些观点可能是从他人那里借来的。但是准确地说，“这些观点”足以建立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普通语义学学派，这个学派与那些在科学上拥有发言权的宗派似的学派，尤其语言学方面的学派，并不一样。同时，“这些观点”也指引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包括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P.W.布里吉曼（P. W. Bridgman）、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他们在附言中提及了柯尔齐布斯基的著作，并对他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观点的赞同。我也希望告诉那些孜孜不倦于简单评论的人，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柯尔齐布斯基的思想有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而言，同样难以轻易把握。

毫无疑问，柯尔齐布斯基的全部灵感来自于为语言功能赋予绝对的价值。当涉及社会问题、尤其牵涉到信念问题时，这个事实便突显出来，柯尔齐布斯基将这个问题简化为语义干扰。比如说，他在努力处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时，依据神经语义的反应情况来给信号（signals）下定义（SES, pp. xxiii-xxiv）。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方式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猛烈攻击，同时，却在斯图亚特·切斯的著作《语言暴政》（*The Tyranny of Words*）（1938）中获得了一丝不苟的继承。同样在柯尔齐布斯基的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事实：只有在语言反映事实本身时，它才能正确地发挥其功用，柯尔齐布斯基学术活动倾向于调整语言结构，而这个观念正是引导他开展活动的主导原则，也被他的后继者们所汲取。（比如，斯图亚特·切斯、欧文·J.李、早川、温德尔·约翰逊）。以下是柯尔齐布斯基就这个话题所发表的观点：

由于词语并不是其所代表的对象本身，因此结构与结构自身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alone*) 成为连接经验数据和我们语词过程的唯一链条。为了获得调整，开发心智，并把握语词所涉及的不同内涵，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世界结构性质的特点，之后，建立语言的相似结构，而不是习惯性地根据最初的语言结构来认知世界。……再者，那些推动语言发展的人，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具有其结构，并天然地将世界反映在语言之中。换句话说，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进入所使用的语言结构世界中。对空想的猜测、归因，大部分源于对世界结构的呈现，而这恰恰是“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与此相反，科学所致力的工作，是通过经验方式探索世界结构，以及构筑起新的语言（理论）、一种必然或相似的结构。任何思考语言结构独特性的人，都不能忽视科学手段，在语义学看来，唯有它才能正确使用语言方法。它依据自然秩序 (*natural order*) 而发展，然而对形而上学却执行的是与自然秩序相反的、绝对的、病理学顺序。(SES,pp.59-60)

这些想法是否正确呢？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们不仅是正确的（阐述过程本身的重要性居于其次），而且对唯心主义和语义哲学批评有重要意义。所以，它们不适合传统模式和陈旧的形式。对于柯尔齐布斯基来说，这些观点并不是偶然的想法，而是他潜心研究的结果，也是他思想的根基。同时，这些观点也已经被他的追随者们从普通语义学学派中所继承。正如温德尔·约翰逊所说：

在研究语言行为时，最关键、且必须考虑的方面，是语言和现实、词语和非词语之间的关系。除了需要认识这些关系外，我们还要尽力把握词语和事实间微妙的联系，大胆地发挥词汇多义性的作用，以此来激发我们想象和幻想的虚构性。^①

斯图亚特·切斯下决心要创作出一部“畅销书”，他也是这么说的： [413]

语义学学科所做出的贡献在于，将虚构的鬼怪从图画中抹去，同时创作出一幅更逼真、且任何人都能领会的新画作。人们不再被教条的、情绪化的“对”与“错”所纠结，而是谦逊、谨慎地意识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他的新地图或许是错误的，他的判断或许是不准确的，但是做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却得到了提升，因为他现在开始根据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来进行判断，而不是依靠头脑中既存的信息。(《语言暴政》,p.361)

^① *People in Quandaries*(New York,1946), p. 113.

仅凭好的语言并不能拯救人类，但是发掘事物名称背后的东西，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结构。好的语言有利于我们与他人交流我们周围的事实，而现在我们却在以我们的拙嘴笨舌，发出含糊其辞的言语。（《话语无情》，p. 361）

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很有道理！与期望相反，这些人确实理解新实证主义者和激进的传统派所不能理解的某些观念。这些观念不应被随便地弃置，而且也不能彻底否定符合“非黑即白”模式的全部评价。

柯尔齐布斯基宣称，自己提倡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来阐释现实，在这一点上，有时至少与某些辩证法支持者的著名观点十分接近。这其实并非巧合，在反对“亚里士多德”语言结构的同时，柯尔齐布斯基也反对所谓思维规律的传统论述。他说：

我们不可能充分地修正这个“逻辑”概念，而建构一个非亚里士多德的、拥有无限价值的非元素主义语义学，它将会在结构上与世界系统、及我们的神经系统相似；但是，不得不提，“身份规律”（law of identity）从来不适用于过程中。“排中律”（the law of excluded, 有时也写作 excluded third）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增添了“二价”（two-valued）的特征，它的存在成为呈现有限事物的一个普通原则，而这并不能让人满意。（SES, p. 405）

然而，“最糟的”事情仍然横亘在我们面前。现在，柯尔齐布斯基把明文（*expressis verbis*）看作是巴甫洛夫理论和他的观点间思想上的“亲属关系”，而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很可能是对的。我甚至越来越相信，柯尔齐布斯基是在巴甫洛夫的影响下才形成了自己的想法。然而，谈到与自己观点的不谋而合，柯尔齐布斯基却声称，他是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非亚里士多德体系之后，才熟悉了巴甫洛夫的观点。（SES, pp. 315-316）

我的修订本从语言学的、结构的、非元素主义的理论角度出发，为人们研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理论提供了新的重要补充材料。事实上，这些独到理论的发现为彼此提供了理论支撑，而这恰恰是理论研究实用性的突出例证。（SES, p. 326）

我不太清楚柯尔齐布斯基是否了解巴甫洛夫理论的信号二次体系（the secondary system of signals），但他展现出的目的（e.g., pp.331-332）却与这个理

论非常相似，连使用的术语都很像。如果两者真的具有同质性，那么事实将是令人震惊的。可是，即便柯尔齐布斯基是在巴甫洛夫的影响下提出自己的理论，问题却依然十分复杂。人类行为所表现出的语义障碍完全契合条件反射理论，甚至也符合信号二次体系理论。神经官能症产生于刺激和压力作用下形成的冲突机制，而针对这种症状，巴甫洛夫给出了准确的解释。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是引起条件反射的信号，同时也是代表信号的信号，这就是词汇。即使我们拒绝讨论柯尔齐布斯基作品中这种奇怪版本的信号病理学，那么语义紊乱问题却依然客观地存在。再者，那个问题不仅仅涉及精神病学层次：正如上文所提，拉波波特曾指出：“人们如何使用文字，文字反过来就如何影响人。”（早川在他的著作《语言与人生》（*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的封皮上写过一句标语似的话：“人怎样使用词语，词语就怎样使用人。”）由此可见，柯尔齐布斯基的观点真真切切地涉及很多研究论题。

在普通语义学学派中，柯尔齐布斯基后继者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这个十分理性的观点，是语言实用主义（pragmatic）研究的一部分，也就是从语言符号制造者的视角出发进行的语言研究。拉波波特用以下方式明确地阐释了这个问题：语法用以考察词语之间的关系；逻辑用以研究命题之间的联系；而语义学则探讨词语与主旨及其指称物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它们的意义和真理性。普通语义学比其他学派发展得都要快，因为它还研究词语和命题对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一个普通语义学家来说，交流不是简单地将词语的起承转合用于正确的位置（如语法学家），也不是断言词语之间的确切关系（如逻辑学家），更不是肯定词语和特定指称物之间的联系（如语义学家），而是以“事实—神经系统—语言—神经系统—行动”^①的逻辑线索为研究宗旨，对上述工作进行整合。

实用主义的影响由此彰显出来，而它的研究是通过符号学来进行的。尽管如此，但普通语义学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取得了进展，却绝非巧合。虽然研究方式不同，但正如莫里斯的符号学一样，普通语义学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影响趋势，其涉及面甚至变得比普通指理论（general theory of signs）更为广泛。

在其理性形式中，普通语义学从以下学科的角度，对人类行为中“神经语义”因素探讨的兴趣愈加浓厚：如心理学、精神病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等等。由此，

^① Anatol Rapoport, *op. Cit.*, p. 14.

普通语义学的拥护者们宣称，这些学科以其论据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环境刺激物的作用下积累经验，同时，通过逐步积累的组织经验，使自身的行为逐渐形成某种恒定的模式。这两种功能，都是在语言的特定方式、结构，以及语言习惯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这样，对具体语言的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我们对此类研究持有怎样的态度，做出怎样的判定，都绝对无法否认其重要性。以下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详尽陈述。

首先要讨论的，与人类交际有关。我们已经知道，普通语义学的最初成功，是由于它对上个世纪 30 年代纳粹主义的骤然得势所引发的兴趣，这便从语义扰动 (semantic perturbation) 的角度解释了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因。这个研究视角是柯尔齐布斯基首先开创的，斯图亚特·切斯、早川、温德尔·约翰逊等人延续了这一方式。1949 年，早川在其新版《语言与人生》的序言中，坦承自己的早期著作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所具有的“过分简单化”的倾向，而对这些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已研究得十分透彻。然而，不少问题还是被遗留下来，它们貌似无足轻重，但在实践中却至关重要：比如，要获得成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一问题备受热议）；在人类交际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阻碍或便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们都以普通语义学原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语言在矫正思考方式、以及在研究社会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方面的意义。教育和精神病学涉及的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柯尔齐布斯基最初对语言符号病理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个领域中发展出来的。 [417]

语言病理学问题的实践性比较明显，却与普通语义学中某些理论性更强的问题相关，例如符号 (sign) 和象征 (symbol) 的作用问题，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在被我称为应用语义学 (applied semantics) 的领域中，所讨论的表达的奇异性和模糊性问题。

最后，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讲，语言对文化的塑型过程具有重要影响，普通语义学则致力于对这种影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囊括了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且都与对语言发展的探讨有关，例如 B.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见奥格登[C. K. Ogden])和瑞恰慈(I. A. Richards)《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的附录部分，[1930])，本杰明·沃尔夫(B. L. Whorf)的《语言、思维和现实》(*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1956])。

普通语义学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然而，我不愿夸大其词地说什么“普通语义学可以与口腔外科相媲美”，而只是想心平气和地描述它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以及它与控制论的姻缘关系。这些话题无不颇具争议，我也为此深感踌躇。事实

上，普通语义学早已研究过这些问题，发表过实实在在的观点，也拥有了自己的文献。许多普通语义学家，都做出过堪称一流的贡献。虽然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但我这里要再强调一遍：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应被轻易地抹煞。我赞同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的观点。在自己的著作中，他根据柯尔齐布斯基的语义学观点，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通语义学的理论基础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但他又补充道：“混乱不堪的理论体系，却往往催生出有用、有趣的成果，这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①补充一句，如果研究的是真正的科学问题，那的确会催生这些成果。

普通语义学的问题属于哲学吗？这是个可以单独对待的问题。普通语义学家们自然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事实上，他们首先是社会技术人员，他们的理论研究更多地涉及到与逻辑学和认知论相关的语义问题，因此与狭义上（*sensu stricto*^②）的哲学相去甚远。然而，普通语义学多多少少会散发些哲学的味道。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便曾鲜明地指出，普通语义学中含有某些唯心主义论调。当然，普通语义学中也含有其他学派的因子，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却忽略了这一事实，原因在于他们过分依赖大纲模式（*schematic pattern*），而模糊了“纯粹”唯心主义的范畴。任何对事实的扭曲都是无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其他思想因子的忽略同样欠妥。这里，我以相同的理由，对此前已经出版的某些著作提出质疑，例如比考夫斯基（B.Bykhovsky）为康福斯的书所写的文章；同时，我也以此质疑那些最近出版的著作。

所有对普通语义学的误解都是有害的，它们与作者们的初衷截然相反，并将因此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尽管鲍里斯·比考夫斯基论语义学的那篇声名狼藉的文章（发表于《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杂志 1947 年 8 月号）得以重新发表出版，但《普通语义学评论》（*ETC.*）杂志的评论专栏（1948 年第 5 期，第 1 至 15 页）中，却看不到评论此文的只字片语；他为《简明哲学词典》（*Concis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俄文版，罗森塔尔·尤金[Rozental Yudin]主编，莫斯科，1951）撰写的词条“语义哲学”（*Semantic Philosophy*）也获得了重印，但在早川的《语言、意义和成熟》（*Language, Meaning and Maturity*）（1945）中，通篇也找不到对它的任何评论。这样看来，对语义学的批判性讨论，与《简明哲学词典》中其他词条的命运如出一辙，这个词典没有经过任何评论就获得再版，并被作为独立刊物，由反共产主义期刊《见证》（*Preuves*）所收录。这样，我们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便认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将消失的意识形态批评”这一论断，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击性宣传品和最有力的武器。那么，

^① Max Black, *op. Cit.*, p. 246.

^② 原著为“*stricte*”应为“*stricto*”与“*sensu*”同为拉丁词，“*sensu stricto*”意为“狭义的”。——译者注

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会引发人们犀利的谴责吗？

（本文原题为 *General Semiotics, A Marxist Philosopher's View*，原刊载于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iotics, Vol. XVII, No.4, 1965, pp. 401-408.*）